

23

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

——战时日本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

经盛鸿 著

[下册]

Devil's Advocate and the apologist Japan news media during WW II and the Nanjing Massacre

By Jin Shenghong

悪魔の吹聴者と弁解者

——戦時の日本報道と南京大虐殺

経盛鴻 著



遇难者
VICTIMS
遭難者 3000000

南京出版社

南京大虐殺史研究と文獻シリーズ
Series of Books on the Studies and Documents
of Nanjing Massacre

張伯興 編
Edited by Zhang Boxing
丛书主编 张伯兴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

系列丛书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



丛书主编 张伯兴

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 ——战时日本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 [下]

经盛鸿 著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战时日本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
经盛鸿著.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 12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
ISBN 978-7-80718-435-5

I. 恶… II. 经… III. ①新闻—传播媒介—研究—日本—
现代 ②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G219.313.9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0382 号

书 名: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
——战时日本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

作 者:经盛鸿

出版发行:南京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210018

网址:<http://www.njpbs.com/www.njpbs.net>

联系电话: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webmaster@njpbs.com

责任编辑:沈丽国

装帧设计:杨 苒

图片提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经盛鸿

印 刷: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39.25

字 数:62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18-435-5

定 价:68.00 元(上、下册)

封面图片为 1937 年 12 月 17 日,拍摄日军南京入城式的《东京日日新闻》摄影队
封底图片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标志碑



第五章 严禁本国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报道

第一节 严密防范本国传媒报道南京大屠杀的四种手法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十多万日军野兽般地冲进南京,对已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与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实施数十天血腥的大屠杀。这是不容抹杀的铁的事实,不仅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西方记者与西方侨民向世界进行了广泛的揭露,不仅身受其害的数十万难民中的幸存者向中外作了血淋淋的控诉;而且,日本随军采访的记者、作家、摄影师、评论家等也目睹了其部队骇人听闻的暴行,其中一些良心未泯的人感到震惊与恐怖,他们很想把这些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情景与事件记录下来,写到他们的报道或通讯中。日军中也有少数人良心未泯,感到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同情。例如,1937年12月25日,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商人拉贝在日记中记载,一个日本下级军官“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的难民们居住的岌岌可危的茅草棚,然后说了一句真心话:‘日本士兵当中也有坏人’”^①。

这些已经或有可能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进行揭露的渠道,引起了

^①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



日本当局深深的忧虑与高度的重视。他们想出了种种办法,采取了种种措施,力图堵塞这些渠道,决不让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消息在日本本国的新闻传媒上有丝毫反映。

第一,严厉防范、严格禁止本国新闻传媒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作任何报道,对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关于“南京战”的新闻报道的写作与发表作了种种严格的规定与审查措施。

如前所述,在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本当局迅速制定、发出了《处理有关时局报道的文件》、“新闻报刊法第27条”“陆军省令第24号”及《新闻掲載禁止事项之标准》《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订纲要》等一系列法西斯式的法令文件,对日本新闻传媒报道日中战事等作了种种十分严厉而又具体的规定,好像撒下了一个巨大而严密的文网,将日本的所有随军采访的记者、作家、摄影师、评论家等统统笼罩其中,使他们不敢、不能、不会写出任何有违日本国策的报道与文章,更使日本所有的报纸杂志不敢、不能、不会刊出任何有违日本国策的报道与文章。若有随军记者、作家胆敢以身试“法”,日本当局就会迅速地、毫不留情地加以严厉的镇压。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指出:

日本受着军阀和财阀的联合统治,议会毫无力量,人民没有民主的权利和自由,没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宪法赋予天皇以至高无上的大权,如有人想到宪法应加以修改,就是大逆不道。1937年12月间和1938年2月间,自由主义的学者、教授、作家和新闻记者数百人以及左派议员两人,因“散播反战言论”,先后被捕入狱。^①

参与南京战役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下级军官曾根一夫说:

^① [澳]田伯烈著,杨明译:《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前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205页。



首先是压制报道自由。为了报道战争,各报社都派遣了随军记者,然而是不许报道真实情况的。战场上监督新闻报道的是高级军人。^①

在南京战场上负责监督新闻报道的则是日“华中方面军”的报道部。他们根据日本当局颁布的一系列法西斯式的法令文件,对日本随军记者关于南京情况的所有报道进行严格的审查。曾根一夫说:

所有稿件都根据这个原则被审阅,凡是对军方不利的报道一律没收。仅仅没收也就罢了,还要受到训斥和处罚。因此,皇军在南京的大屠杀自然关乎皇军的体面。这种事如果让(日本)老百姓知道了,皇军将颜面扫地。因此,虽然有很多随军记者目睹了南京惨状,却没有一个人报道。即使有,也不会被发表。当时报道南京攻击战的报纸和广播,异口同声地歌颂皇军的丰功伟绩、赫赫战果。^②

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感叹道:在日本当局制造的这样严酷的新闻管制与社会氛围内,“向这一禁忌挑战的记者一个也没有,不免让人感到寂寞”^③。

如本书前已有的论述,日本随军来到南京采访的记者与作家中确有少数人,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感到震惊、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同情,曾想把这些他们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情景与事件记录下来,写到他们的报道或通讯中。但最终,他们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望而却步了。当然,即便他们当中有人写了,也不会得到发表,而且他们本人将遭受迫害。这在本书后面将有论述。

第二,对日本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拍摄的“南京战事”的新闻图片与电影新闻纪录片进行严格的审查与控制。

^{①②} [日]曾根一夫:《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战史中没有记载的战事故事》;前引《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第254页。

^③ [日]秦郁彦:《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中译文转引自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日方当局规定,对于日本随军记者、作家、摄影师乃至日军官兵私人在中国战场实地拍摄的各种照片,就像对待日本记者写的文字报道一样,都要事先进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当时,日本各新闻单位派赴中国战场随军记者拍摄的照片每天都要以航空寄回总社。日方当局规定,日本各新闻单位总社必须将每张照片加洗四张,送陆军省、海军省与外务省情报局审批,其中三张分别由上述三个单位留底保存,还有一张退还各新闻单位总社,并在此张照片上盖有不同的印记表示审查处理意见:若盖有“检阅済”印记的照片,就可以在报刊上发表;若盖上“不许可”印记的照片,就严禁在报刊上发表,甚至严禁泄露。每个新闻单位每天都有大量的新闻摄影图片遭受“不许可”的厄运,难见天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后改名称为《每日新闻》)社等新闻单位将每天退回的印有“不许可”印记的大量照片与文字说明收藏起来,每年都能装订一大本。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本军部命令各新闻单位:“可当作战争见证的资料,必须全部销毁!”^①许多新闻单位都照做了,销毁了许多印有“不许可”印记的照片本。但《每日新闻》社的摄影部主任高田正雄拒绝这一命令,将历年积累的“不许可”照片本藏在大阪总部的仓库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以后重见天日,成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与新闻封锁的重要证据。^②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社的随军摄影师佐藤振寿亲眼看到日军在南京励志社残酷杀害大批中国战俘,但他没有拍摄下这些场面。他说:

事后,我向同伴说及此事,他反问我:“身为摄影师,你为什么没有将那些拍下来呢?”我只得回答说:“如果拍了照片,说不定我也会被杀。”^③

① 李抗和主编:《血泪抗日五十年摄影全集》第4册,[台湾]乡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页。

② 吴广义编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③ [日]佐藤振寿:《步行随军》;前引《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第471页。



至于日本电影摄影师拍摄的电影新闻纪录片,日本当局更进行严格的审查与控制。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第二制作部(文化电影部)的摄影师白井茂与录音师藤井慎一等人,于1937年12月14日到达南京,拍摄日军占领南京的新闻,历时约20余天,于1938年1月中旬回到日本。在1938年2月20日制作成一个小时的电影新闻纪录片《南京》。他在南京曾亲眼看到日军大屠杀的惨况,这在本书前面已有论述,但他的电影新闻纪录片《南京》却没有一点反映。他无奈地说:“我不可能将所看到的都拍摄下来,即使拍摄下来的也要进行剪辑。”^①

第三,对西方记者或中国记者写的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通讯等,更严禁日本各新闻传媒转载或刊登片言只字。

据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在战时主办的《出版警察报》第111、112号记载,仅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这三个月内,日方当局就查禁了大量海外报纸杂志(包括英文、中文)进口,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些报纸杂志刊登了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等的报道或文章。其中有:

1937年12月份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上海:《大美晚报》)12月23日——刊登《南京城的暴虐令司令部惊讶,军队失控》。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上海:《大美晚报》)12月24日——刊登《时报的揭露》。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上海:《大美晚报》)12月25日——刊登《目击者述说在南京日本军的暴行》。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上海:《字林西报》)12月25日——刊登《日军在华、在南京已失去了极大的声誉:攻占首都后立即强奸、掠夺》。

The China Press(上海:《大陆报》)12月25日——刊登《日本军野蛮行

^① [日]白井茂:《摄影机与人生——白井茂回忆录》;前引《南京大屠杀史料集》(33),第424页。



为的确证》。

The North China Herald(上海:《北华捷报》)12月29日——刊登《占领首都时的强奸掠夺》。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天津:《京津泰晤士报》)12月31日——刊登《占领首都后的强奸掠夺》。

The China Critic(上海:《中国评论》)12月30日——刊登《南京的强奸》。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香港:《南华早报》)12月25日——刊登《南京陷落的恐怖活动》。

The People Tribune(香港:《人民论坛》)12月26日——刊登《在南京日本的文化使命》。

《天光报》(香港)12月26日——刊登《国人如何清算此血染之账簿,敌人在首都进行大屠杀》。

《工商晚报》(香港)12月25日——刊登《敌攻陷南京后恣意屠杀,壮丁五万人惨遭杀害》。

《循环日报》(香港)12月27日——刊登《南京来港的西洋人,愤慨述说日军蹂躏南京之情况》。

《越华报》(广州)12月25日——刊登《美国记者发表敌人在南京奸淫、掠夺、蹂躏之惨状》。

《工商日报》(香港)12月25日——刊登《敌军在南京恣意大惨杀》。

《工商日报》(香港)12月26日——刊登《敌军在南京恣意大惨杀》。

《国华报》(广州)12月26日——刊登《敌人在南京奸淫、掠夺、大屠杀》。

《星洲日报期刊》(新加坡)12月26日——刊登《日军兽性发作,在南京屠城》。

《新报》(雅加达)12月27日——刊登《在南京日本军的兽行》。

The New York Times(美国纽约:《纽约时报》)12月18日——刊登《俘虏全遭杀害》。



The New York Times (美国纽约:《纽约时报》) 19 日——刊登《日军正在控制在南京的过火行为》。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美国纽约:《纽约先驱论坛报》) 12 月 25 日——刊登《南京沦陷后恐怖状况之报告书》。

The Times (英国伦敦:《泰晤士报》) 12 月 18 日——刊登《南京的恐怖:劫掠、屠杀、占领者残暴的行径》。

1938 年 1 月份

The Times Weekly Edition (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周末版》) 1 月 23 日——刊登《南京的恐怖》。

Life (美国芝加哥:《生活》画报) 1 月 10 日——刊登《关于攻掠南京的纪事和照片》。

《中山日报》(广州) 1 月 23 日——刊登《兽行疯狂发作,敌人屠城南京》。

The Natal Mercury (德班) 1 月 29 日——刊登《在南京残忍和色欲的乱舞》。

《新闻》(美国西雅图) 1 月 10 日第 4 号——刊登《在法西斯统治威胁下的日本》。

1938 年 2 月份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英国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卫报》) 2 月 7 日——刊登《南京的恐怖状态》。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英国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卫报周刊》) 2 月 11 日——刊登《关于日军的掠夺与暴行》。

《华字日报》(香港) 2 月 21 日——刊登《逃出南京来到汉口者的谈话》。^①

1938 年 2 月初,日本同盟社驻英国记者发回了英国《每日电讯报》1 月

^① [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的证明》,[东京]朝日新闻社 1986 年 3 月 5 日第一版,第 225~227 页;中译文转引自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36 页。译文略有改动。



28 日刊登的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报道的介绍,日本内阁情报部立即下令:“不发表。”^①

1982 年,日本《每日新闻》的前坂俊之曾撰写题为《受到检查的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刊登在《现代之眼》1982 年 12 月号上。这篇文章根据《出版警察报》的资料,对当时日本报刊受到查禁的有关日军在华暴行,包括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新闻报道作了统计:“由于涉及皇军威信失堕的内容”而被禁止发表的新闻报道,在 1938 年 1 月有 25 件,在 2 月有 109 件,在 3 月有 48 件。其中,“对无辜人民之残暴行为”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 1938 年 1 月有 9 件,在 2 月有 54 件,在 3 月有 29 件,占被查禁总数的 50%。^② 这些遭查禁的报道文章,既有日本记者写的,更多的是中国与西方记者写的。

第四,严防日本回国官兵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流言(小道新闻)”的流传。

从中国战场回国的大量日本官兵,常常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在日常的生活与谈话中,将他们在中国战场的经历与见闻向别人介绍甚至炫耀,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的种种暴行,很快就成为在日本民间广泛流行的“流言(小道新闻)”。这些“流言(小道新闻)”的内容与日本报刊杂志上宣传的内容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日本当局深知,这些“流言(小道新闻)”的流传必将影响日本的舆论,最终必将影响日本的报刊杂志与海外新闻传媒。为此,日本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防止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回到日本国内自觉或不自觉地散播在南京暴行的真实情况——阻断“流言(小道新闻)”的新闻源。英国记者田伯烈在 1938 年初写的著作《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写道:

① [日]《绝密、内阁情报部一三一、情报第三号》;中译文转引自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 页。

② [日]前坂俊之:《受到检查的南京大屠杀》,刊[日]《现代之眼》1982 年 12 月号;中译文引自高兴祖:《南京大屠杀与日本战争罪责》,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6 页;又参阅[日]洞富雄著,毛良鸿、朱阿根译:《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51~352 页。



(日本)伤兵不准单独接见亲友,不准自由发表谈话。由于严峻的统治检查,日本人民不知道中国的抵抗很为坚强有力,不知道这一次战争的结束将遥遥无期。日本政府深恐真相一旦泄露,人民的情绪就随之低落。^①

据曾参加进攻南京与大屠杀的日军低级军官曾根一夫说:

为了不使军队在战地的恶的一面让国民知道,在强化新闻管制的同时,对在战地的士兵的泄漏严密封锁。南京攻击战结束后,部分老兵返回国内时就被禁口。我也是昭和十五年(本书著者按:指1940年)秋返回国内的,在离开所属部队之际,被告诫“诸位回到国内,征召解除就成了地方百姓了,但作为军人的名誉是值得自豪的,而有污皇军体面的事绝对不许外传”。这是繁琐的说法,要而言之就是“即使回到国内,离开军队,在战场干的坏事也绝对不许说”。^②

到1939年2月,以板垣征四郎担任陆相的日本陆军省针对“从中国回去的日本士兵讲述陆军在中国的罪行故事,并且炫耀他们所抢劫的脏物。这种日本归国士兵的行为,成了极为普遍的现象。……(为了)努力想避免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好批评”,于是专门由次官山协签发了一份被称为“最密件”的“特别命令”——《限制由支(那)返日军人言论的命令》。该“特别命令”由参谋次长通知在中国各战场的日本陆军各指挥官,“详细地谈到归国士兵应行纠正的不良行为。其中说:兵士们把他们对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残酷行为当故事谈是不对的”。该“特别命令”列举了返国军人向亲友谈话内容若干种,明令禁止传播:

① [澳]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前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205页。

② [日]曾根一夫:《南京屠杀和战争》,[东京]泰流社1988年4月24日第二版,第106页;中译文转引自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1页。



某中队长非正式地对强奸给予下列的训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予金钱，或则于事后将其杀掉以灭口。”

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是杀人、强盗或强奸的犯人。

在战斗期间最喜欢的事情是抢劫，甚至有人因为长官在第一线上也是见了装做没看见似的，所以竟尽情抢劫。

在某某地方抓到了一家四口，把女儿当作娼妓似的玩弄了一番。因为父母一定要讨回女儿，所以把他们杀掉了。留下来的女儿一直到出发前还不断被侮辱，到出发时又杀了她。

在大约半年的战斗中所想得起来的就是强奸和抢劫一类事情。

在战地中我军的抢劫是超出想象以上的。

把中国兵的俘虏排成单行，然后为试验机关枪的性能将其全部射死。

关于归国士兵携带掠夺品回国问题，曾承认某指挥官对部属发给了盖有部队长印、准士兵将掠夺品运回国内的许可证。

该“特别命令”宣称：

归国将士的不妥当的话语，不仅成为流言蜚（蜚）语的原因，而且损伤了国民对皇军的信赖，甚至会破坏后方的团结等等。所以再度通令，以后应更十分严格地加以指导和取缔，一则使赫赫的武功善始善终，一则使皇军的威武高度发扬，以期毫无遗憾地贯彻圣战的目的。^①

1941年，日本兵务局长在参谋长会议上做报告时，专门讲了对日军“归还军人”的言行要十分注意，称“归还军人”“对（日军）军风纪不良状况的言过其实的夸大，虽非恶意，但逐渐培养反军反战思想”，故而要特别地予以

^①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90～491页。



重视。^①

为贯彻这些密令，日本当局对“归还军人”采取了许多严厉的管制措施：所有从中国战场回归日本的官兵，其所携带的物品必须有部队长发给的许可证，必须经由日本军部设在广岛的“检疫所”进行检查，然后方可在日本登陆。广岛“检疫所”的宪兵在进行检查时，必须扣留一切记载战争暴行的文字、照片资料，归国官兵在日常谈话中更必须遵守言论控制令的严格约束等等。

对违反管制措施、散布“流言”的日军归国官兵，日本当局则进行严厉的惩罚。例如：

经营洋装店的住德藏，因为散布“流言”，说：“日军的粮食运输供应不及，连续几日没有得到粮草，不得不以山芋为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不能供应粮食为由，在长江边枪杀了 12 000 名俘虏。”结果被日本当局以违反陆军刑法为由起诉。

日佣小林末造因为说：“上海附近的战斗中，我军扫射了约 20 000 名中国俘虏，尸体漂浮在长江上。”也以违反陆军刑法被日本当局起诉。

依据当时日本陆军刑法第九条的规定，在战时以及事变发生之际，对散布“流言”的人，实施三年以下徒刑的处罚。^②

曾参加进攻南京与大屠杀的日军士兵曾根一夫说：

参加南京战役的官兵陆续回国之后，大家都缄口不谈在南京屠杀大量非战斗人员一事。一方面是回国时被告诫不要乱说；另一方面，大家认为这是一种耻辱。

而且，一不小心说漏嘴的话，宪兵、警察就会来找麻烦。每当参加过南京战役的士兵回国，一些略知一二的国民前去打听究竟时，一般人都推脱

① 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1 页。

② [日]吉田裕：《南京事件真的不为人知吗？》；[日]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十三个谎言》，柏树房 1999 年出版；易青译，未刊。

说：“我所在的部队没干那些事。”^①

日本进步史学家洞富雄在 1982 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定本一书中指出：

从战场上回国的士兵也受到言论控制令的严厉约束，几乎没有人泄漏此事。^②

第二节 严厉镇压“违法”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作者



石川达三

对违反当局规定、客观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记者与新闻传媒，日本当局则进行严厉的惩罚与镇压。

有一位日本随军作家，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到南京采访，由于各种原因，写了一本反映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真相的著作。这就是石川达三及其写作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

石川达三(1905—1985)是日本著名的作家。1905 年生于日本秋田县平鹿郡横手町，早稻田大学毕业。早在 1936 年他就以长篇小说《苍氓》获得了日本首届“芥川龙之介文学奖”。1937 年 12 月 29 日，他作为日本《中央公论》的特派记者被派往南京采访，并约定为《中央公论》写一部以日军攻克南京为题材的纪实小说。石川达三从东京出发，于 1938 年 1 月 5 日到达上

① [日]曾根一夫：《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战史中没有记载的战事故事》；前引《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第 255 页。

② [日]洞富雄著，毛良鸿、朱阿根译：《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 页。



海,当月8日到达南京。

当时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虽有所收敛,但还在继续。日军在南京留守担任警备的部队是第16师团。如前所述,第16师团是日军中一支最凶悍残暴、杀害中国军民最多的部队,于1937年11月中旬从华北战场调到华中,成为进攻南京的主力。著名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就发生在该师团。该师团的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被称为“魔鬼”,在日军占领南京后,被任命为南京地区的警备司令官。石川达三在南京该师团部队中采访了约7天,直到1月15日离开。在这期间,石川达三深入日军士兵中,采访调查第16师团从华北奉调华中,在常熟白茆口登陆后,经无锡、金坛、句容、汤山,直到南京紫金山、中山门的杀伐历史及种种“故事”,并到南京城内外发生重要战事与大屠杀暴行的实地考察,身临其境,加深认识,加强感受。他说:“我去南京时决心不见军官和军队首脑。我和下士官、士兵在一起生活,倾听他们的谈话,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军官对外人总是说谎话,装饰门面。我想看到战争的真实情况,便深入到士兵中去。”^①石川达三耳闻目睹了大量的日军攻占南京前后的实况与大屠杀的暴行,深为震动。他回到日本后,在1938年2月1日至11日,即在日军南京大屠杀刚刚收敛后约数日,就用约10天的时间,写出了反映南京战事的著名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作品以日军第16师团为原型,虚构了一个高岛师团,以该师团的西泽联队仓田小队的几个下层官兵作为主角,描述了他们参加进攻南京战役与占领南京后对中国军民大屠杀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剖析了他们的心态。尽管作者是以自然主义的态度写作,作品有“战场环境决定论”与“人的本能论”等为日军暴行开脱辩解的错误倾向,但却客观、生动地展现了日军在南京残忍野蛮的烧杀淫掠的历史真实。

例如对日军血腥屠杀中国军民,作品一开头就展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情景:日军下士笠原伍长抓住一个不明身份的中国青年,不加询问,让此青

^① [日]石川达三著,金中译:《活着的士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年坐在河岸上,然后挥刀砍下其脑袋,将其尸身扔进河中。

作品写道:

对于笠原下士来讲,杀死一个敌人,如同用手捻死一只蚂蚁。他杀戮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①

其他官兵都羡慕与效法笠原下士杀人不眨眼的“勇敢行为”与铁石心肠,争相加入杀人的行列:

他们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近藤一等兵“怡然自得地骑在裸体女人的身上。……使尽平生气力,把右手的匕首刺进女人乳房的下部。……她两只手握住匕首痛苦地呻吟着。……她经过一阵痛苦的折腾之后,终于不动了,死了。围观的士兵就站在紫黑色的血泊之中”^②。



日军在砍杀中国战俘

武井上等兵仅仅因为被征来为他们做饭的一个中国青年偷吃了一块用来做饭的白糖,就“掏出腰间的匕首,毫不犹豫地插进了青年的脊背,匕首直透青年的前胸。那青年惨叫着倒进了水塘里,激起的水波溅出几十米远”^③。

平尾一等兵只因为一个中国女孩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而影响了他们的休息,便“像疯子一样,一边高声喊叫,一边对着女孩连捅三刺刀”。其他士兵也一齐扑上去,“各用自己的

① [日]石川达三著,钟安庆、欧希林译:《活着的士兵》,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9页。

② 同上书,第25~27页。

③ 同上书,第57页。